

# 牡丹社事件頭目阿祿古父子頭顱 所在及其相關問題探究



「牡丹征伐石門進擊」(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

(引自：<https://archive.library.metro.tokyo.lg.jp/da/detail?tilcod=0000000003-00220884>)

陳光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44 期 2025.6

## 壹、緒言<sup>①</sup>

1871年10月29日，宮古島平良親雲、上宗根玄安等人搭「中立號」、「山原號」貢物運搬船至琉球那霸中山府納貢，返航遭風。「山原號」於11月6日飄抵臺灣東南海岸八瑤灣，船員69人中3人於換搭小船欲登岸時溺斃，餘66人登陸。因懷疑指路漢人居心叵測，不顧其應往南行勿往內陸將至「大耳番」領地之警告，進入內陸求生。諸人抵達高士佛社地，受該社原住民薯米飯款待，但也被強奪身上衣物。由於彼此言語不通，原住民舉止致疑，宮古島民分批趁夜逃走，高士佛社人覺而追之，過程如何？是否有新的衝突與誤會，史未有明文，其間亦有數位漢人極力斡旋、庇護、拯救、以物抵命交換，但終肇成高士佛社人馘首54名宮古島民的「宮古島民罹難事件」。<sup>②</sup>倖免於難的12名琉球人，由漢人送至臺灣府，轉至福州，後乘船返回琉球，其遭遇由琉球中山王轉報當時轄制的薩摩藩，再上報明治政府。

事件騰傳日本之後，以琉球保護者自居的舊薩摩藩武人，強力主張出兵攻臺；日本政府經過國內征臺／征韓二派角力，終至1874年2月爆發「佐賀之亂」，於亂事收平之後，<sup>③</sup>決定以琉球宗主國之姿，以保護遭難屬民大義為名，派兵征臺。積極整備，購買或租用英、美船艦，招募兵員，在長崎候命。一度又因國際社會疑慮干預下退縮，但終因以曾支配琉球的薩摩藩舊部武士的悍然不受朝命，於明知大久保利通即將到來阻止出兵前夕，於1874年4月27日由美籍顧問海軍中校克沙勒（Douglas Cassel）、工兵中尉華生（James Robert Wasson）與參謀福島九成（Fukushima Kyusei）等先頭部隊搭乘有功丸<sup>④</sup>從長崎出發，經廈門航向臺灣，而征臺都督西鄉從道（Saigo Tsugumichi）與軍事顧問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則受阻滯留日本。

大約100人的先發部隊於5月6日晚間抵達琅璦灣，8日在保力溪口北岸登陸後，除了設置營地外，並由克沙勒挈帶翻譯負責安撫附近原住民，以孤立牡丹社與其

<sup>①</sup> 此節關於琉球人罹難至發生牡丹社事件的過程內容，綜採《處蕃提要》（黃得峰、王學新中譯2005）、E. House《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豪士2015）、水野遵《臺灣征蕃記》（林呈蓉譯註2011）、落合泰藏《明治七年生蕃討伐回顧錄》、落合泰藏〈醫誌〉（賴麟徵中譯1995a）、林修澈（2017）、周婉窈（2015）等諸書與諸家之說，並參以敝人的理解，不另出引。

<sup>②</sup> 日方稱之為「臺灣事件」、「臺灣遭害事件」、「宮古島民臺灣遭害事件」或「琉球漁民殺害事件」（參見林修澈2017），本文稱「宮古島民罹難事件」。

<sup>③</sup> 佐久間左馬太於1906年4月就任第四任臺灣總督，6月回憶當年牡丹社事件時，承認：「吾輩之征討臺灣也，雖因琉球之漂民五十四名為牡丹蕃所殺戮，而興問罪之師，為之動機，然究亦緣之征韓論之結果，即江藤新平等唱此議論。政府之議論，又分為二，遂起江藤等之亂，彼此紛紜，譬若在內國忽起大腫，其膿汁噴出，而及於臺灣也。」（不著撰者1906a）美國上海總領事George Frederick Seward（熙華德）於1874年11月11日致美助理國務卿John Lambert Cadwalader的信函則言“A number of her restless men, supported by an idle soldiery, made a foreign enterprise the alternative of civil war.”見House and Senate Documents, 1672 H. exdoc: Foreign Relations, 1875, pt. 1, p. 405。

<sup>④</sup> 有功丸（Yuko Maru）原名Nepaul（ニッポール），為英國Thames Iron Works & Shipbuilding Company所造，見[https://poheritage.com/wp-content/uploads/ship-data-pdfs/NEPAUL%20\(1859\).pdf](https://poheritage.com/wp-content/uploads/ship-data-pdfs/NEPAUL%20(1859).pdf)（2025.04.21搜尋）。

聯盟如高士佛、爾乃等社。後續部隊陸續抵達，日軍亦屢屢派遣兵員對周遭形勢與聚落斥候偵蒐，一面尋找更適合的營地，期間偶有零星的狙擊或小衝突，少數日軍為原住民鹹首。5月21日，在另一次於四重溪小型遭遇戰後，日軍立即派遣約250人進援，於該日傍晚抵達事發地點，並以四重溪口周邊三聚落原住民武器有使用痕，行跡可疑，入社公告並悉數收繳其武器。22日上午，後來號稱「鬼佐久間」的佐久間左馬太參謀率支援兵力抵達。部份士兵不顧命令，午飯後嘗試沿四重溪前行，於石門受狙擊而應戰，日軍涉水前進，原住民於半山或石堆後狙擊，雙方互有傷亡，後日軍由右坡迂迴側翼攻擊，原住民不支敗走，估計死傷者為數甚多，戰場留下若干無法移動的重傷者與不及帶走的原住民屍體，當場被日軍割下首級，後來被指認其中包括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此役參戰人數，日方約150人，原住民約70人，為日軍征臺爆發的規模最大的戰役。西鄉從道於當日晚間乘高砂丸進入社寮之後，日軍隨後於6月1日展開三路作戰計畫，各路沿途狠擊，焚毀聚落，並未遭遇大的抵抗，最後於牡丹社奏凱會合。

日軍登陸南臺，且其目的不止於琅璦，而在更廣的臺灣南端甚至東部所謂的生蕃之地，各國都獲有諜報，甚且相互間且與清廷互通消息。清方雖然也有偵知，但反應十分遲緩。後來派出大量兵員渡臺，擺出不惜一戰之姿，而實際態度仍然是避戰；就在外界所稱「受渴望和平的驅使，即便在失去尊嚴的代價下，單純逕直地承認日本出兵為義舉。」<sup>⑤</sup>而日方也因疫疾橫作，死病相繼，經費支出未見所止，清日雙方心同意近，於該年10月31日簽訂北京專約，由中方賠款承認琉球屬日，日軍退兵，結束此一各界震動，美國官方稱為 Formosan difficulty <sup>⑥</sup> 的戰事。

牡丹社事件起因的原受害者，罹難的54名宮古島民，其體骨由雙溪口原葬處遷至統埔庄，立碑紀念，之後直至日治時期委人定時祭掃、修墓，臺灣總督偶亦往視，<sup>⑦</sup>也有學者就其頭骨與墓葬專文研究，<sup>⑧</sup>宮古島後人亦不時來掃，今日，屏東縣政府更於2011年將該墓登錄為歷史建築，善加維護。西鄉從道派人從原住民聚落

- <sup>⑤</sup> “I am not able to say whether the Chinese have made an unqualified admission that the Japanese were right in going to Formosa. Nor can I say whether, if they have made this admission, they have not been actuated by a desire to preserve the peace, even at the cost of their own dignity.” 見當時美國在上海總領事熙華德於1874年11月11日給助理國務卿 John Lambert Cadwalader 的信件。收入 House and Senate Documents, 1672 H. exdoc: Foreign Relations, 1875, pt. 1, p. 405。
- <sup>⑥</sup> 1874年11月9日美國國務卿 Hamilton Fish 給駐北京代辦 Samuel Wells Williams (衛三畏) 的信件，見 House and Senate Documents, 1672 H. exdoc: Foreign Relations, 1875, pt. 1, pp. 220-221。亦有稱之為 Formosan trouble。
- <sup>⑦</sup>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佐久間左馬太於1906年4月新任臺灣總督，隨即於該年7月2日上午至石門，觀明治7年日軍與牡丹社苦戰場舊跡，而該社蕃人帶當年日軍所賜日本國旗二枚來迎。下午至統領埔庄參拜琉球人墓，由林阿九之子林扯獅備辦豬羊酒禮，楊阿古之子楊阿才亦至，佐久間賞予楊阿才25圓，林扯獅10圓（不著撰者1906b）。按：琉球人死屍原由粵人鄧天保暫埋於溪口，保力庄楊阿古、統領埔庄林阿九收拾骸骨移葬於統領埔庄。
- <sup>⑧</sup> 山中樵（1931），〈琉球人の髑髏〉，筆者未見，參又吉盛清編《台灣事件關係資料論文集》。

中取回的 44 具頭顱經過清理並帶回東京轉交琉球改葬。<sup>9</sup>相較於此，在此一事件下難以估計數量的原住民死難者，自始至今，無人聞問。除了阿祿古父子等若干原住民被馘首，首級疑似被攜至日軍大營的記載外，在日軍大軍碾壓、社人逃散、聚落焚燼之下，衆多罹難兇死的排灣族人，何時何人爲之收拾？事件後僅 20 年臺灣即由日領，當年戰役的歷史書寫既由統治者定調，原住民的視角無由呈現，即便至今日猶然。

2016 年開始，文化部啓動「再造歷史現場」計畫作爲重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sup>10</sup>所揭櫫的四項原則之一<sup>11</sup>：「深化連結土地與人民的歷史傳承，是重新發現歷史、再現歷史記憶，透過軟體帶動硬體的規劃，將文化價值與當代重新連結，其重點在於復育文化生態，而非一味復舊。」廣邀全國各縣市申請計畫，屏東縣政府以事件已逾百年，除史蹟外，文獻大都以漢人、美國人與日本人觀點書寫，缺乏原住民觀點，甚至成爲禁忌，造成「世代性的記憶斷層或是認知偏差」，爲了能「讓事件不僅是時間上的紀念活動或是山頂上豎立的石碑，而是發生在家園的共同記憶」，擬定「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計畫」，<sup>12</sup>以「『牡丹社事件』」爲主，透過歷史研究及場域調查，分析與此歷史事件相關之有形及無形自然、歷史、文化、產業等資源，研擬『牡丹社事件』歷史範圍及歷史場域點之再造方案，修護並活化歷史場域風貌，再現歷史記憶。<sup>13</sup>

筆者忝爲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計畫輔導團顧問，曾數度參與「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計畫」的輔導訪視，對該計畫執行的內容與方向提出諸多建議，其中一項是筆者多年前閱讀知悉，並一直留意的牡丹社人頭骨特徵研究論文所透露的頭骨可能流向，在 2018 年 12 月 14 日第一次「屏東縣牡丹社事件、羅妹號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計畫」第一次輔導訪視會議上，即建議計畫執行團隊應積極尋訪石門戰役被馘首的原住民頭骨所在，設法迎回並參酌原住民慣習歸葬，應將此視爲「歷史再造現場」計畫極爲重要的工作，若能迎回將是總計畫吸引國人注目的重大成就。爲此，筆者數度敦

<sup>9</sup> 《平良市史》第三卷《資料篇・前近代》〈本年東京送來髑髏〉：「此年有上屆未年內地及太平山等人飄入台灣，逢其殺害。東京之人到去台灣，拾取髑髏，送來本國。隨召其親戚人等暨在內地太平山吏役，告諭其由。因其不分明，將伊髑髏合葬雪崎茅籍，令僧吊祭，建碑爲記」（平良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 1981: 665）。又明治 31 年（1898）沖繩縣知事奈良原繁〈臺灣遭害者ノ碑文〉指出，西鄉從道「拾取遺骸，齋歸，葬之若狹町上之毛，而墓地偏僻不便，於是有意相謀，釀資，移之護國寺之域，建石表之」（慶留間知德編 1929: 43）。太平山爲宮古島舊名，可確認 1874 年 12 月日軍撤軍時，將從原住民聚落取回疑似琉球人頭骨帶回日本。另參郭伯倫（2015）一文。

<sup>10</sup> 計畫緣起爲：「爲落實『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之核心理念，打破過去單點、單棟的、個案式的文化資產保存，提出以『再造歷史現場』爲『重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透過結合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空間治理，整合地方文史、文化科技，並跨域結合各部會發展計畫或各地方政府整體計畫，重新『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地文化』、『以提升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參該計畫網站 <https://rhs.boch.gov.tw/rhs/about.aspx?id=1>（2023.12.08 搜尋）。類似文字見 2017 年 11 月 20 日文化部修正「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緣起（邱上嘉、黃妙婉 2018: 144）。

<sup>11</sup> 該計畫網站 <https://rhs.boch.gov.tw/rhs/about.aspx?id=1>（2023.12.08 搜尋）。

<sup>12</sup> 計畫由該縣文化資產保護所執行，其中學術調查子計畫則委由青島文化制作與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sup>13</sup> 此段關於「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計畫」引文，採自該計畫書 2019 年 8 月 26 日修正四版，頁 2,5。

促並提供相關的論文與資訊。<sup>14</sup> 經過學術調查單位聯繫，確認有體質研究文獻的四顆頭骨所在（青島文化制作、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 2020: 53），而此四顆頭骨的迎回工作，也幸而受到文化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注意與重視，啟動相關計畫。<sup>15</sup>

學術調查研究報告（前引報告）雖然對於這四顆頭骨的流傳收藏有相當詳細的研究，<sup>16</sup> 但是還有一些問題尚未釐清，筆者嘗試鉤稽史料，以現存四顆流外的牡丹社人頭骨為起點，對石門戰場死難原住民頭骨的去向以及一些相關問題試作討論，希望能以敬畏審慎的心意，對這批原住民頭骨的歷史資訊提供更多的訊息。

## 貳、石門戰役原住民死亡人數、被砍下頭顱數量以及頭目阿祿古頭顱所在

日軍 1874 年征臺發生的規模最大的石門戰役（圖 1），原住民死傷人數以及被馘首的數量存有眾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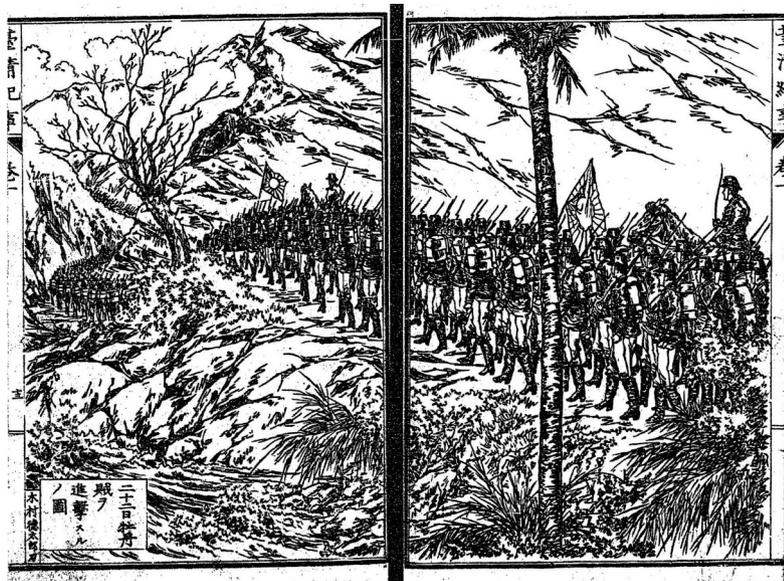


圖 1：1874 年 5 月 22 日，日軍進擊石門圖（引自：津江左太郎〔1875〕，卷上，頁 13）

- <sup>14</sup> 「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計畫」中的學術調查子計畫，筆者曾數度在審查、訪視會議上敦促執行團隊與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應積極進行流外頭骨的查訪與迎回作業準備工作；第一度告知有此四具頭骨流外應予查訪；第二度提供 Eldridge (1877) 與 Turner (1907) 兩篇論文並再次敦促；第三度直接告知四具牡丹社人頭骨應收藏於英國愛丁堡大學解剖學博物館，應去信確認，而以國際文資觀念，迎回人骨的可能性高；第四度要求學術調查報告應對此四具頭骨政府的後續作為提出建議。
- <sup>15</sup> 原藏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四具牡丹社人頭骨已於 2023 年 11 月 5 日迎回臺灣，目前暫存於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
- <sup>16</sup> 該報告相關內容以〈從南國到萬國——牡丹社事件與十九世紀人類學知識的全球交流〉為題改寫（姜可祐、涂豐恩 2020），在此調查研究計畫案籌辦的「南國與萬國的交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並於會後之論文集出版。

西鄉從道於 1874 年 5 月 22 日石門戰役發生當天，呈報給在長崎的蕃地事務局有關此戰役的報告書（圖 2），說明「擊斃蕃賊十二名，傷者不知幾人，步槍及弓、箭、鎗等戰利品不計其數。」「本日於戰場斬取之十二顆首級中，當地人均稱有一長相極為面熟者為生蕃頭目，經再次檢查，發現其兵器及其他物品等皆與衆人所持者不同，由此足證其言可信。」（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84-185）此當為石門戰役當天報告，有可能因戰場清理未遍，雙方死傷數字並不完全正確，戰後原住民因此役死亡或因之死亡的後續消息打探結果，有可能增加此統計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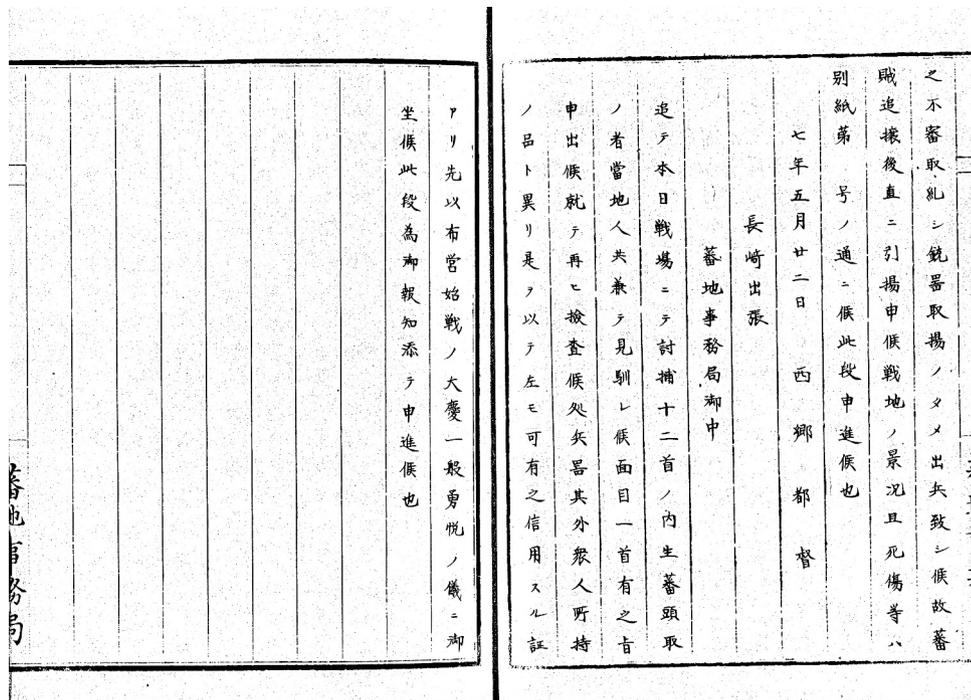


圖 2：「西郷都督ヨリ双溪口戦状届書」（引自：國立公文書館藏，JACAR Ref. A03031034300）

石門戰後，琅瑤十八社中有六社頭目央求歸順，西鄉從道於 5 月 26 日致函蕃地事務局長官大隈重信（Ōkuma Shigenobu），說明石門一役後諸社頭目來降之事，亦重述此戰：「經過二小時，蕃人終於敗走，斬獲首級十二顆，估計其他死傷者為數甚多，上述首級中因牡丹社酋長首級亦在其中，當地人甚至前來加以鞭笞，……昨二十四日，生蕃十八社中豬勞束一等酋長卓其篤……進獻牛、雞等物，央求歸順……，面談中，彼等也表示，石門之戰牡丹人戰死三十多人，因聞其中酋長父子兩人亦於此戰中陣亡，甚為恐懼。此事由其他場合亦有相同之傳聞，且其屍體上配帶與昨夜會面之諸酋長相同之袖徽章與銀製耳環，因此確認其身份無誤。」<sup>17</sup>（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09）以此，西鄉確認石門戰役原住民戰死 30 餘人，並確認所斃首級中包括牡

<sup>17</sup> 伊藤久昭，《臺灣戰爭記》卷三，頁 5 所記同。

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sup>18</sup>在其於 1874 年 11 月所立之〈琉球蕃民枉死之碑〉銘文即稱：「五月，擊兇徒於石門，斃巨酋阿祿父子以下三十餘人。」（西鄉從道 1877）應該是日本軍方認可石門戰役原住民死亡的數字，並確指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均死於石門戰役並被馘首。

## 一、馘首 12 具說

至於此役原住民被馘首的數量，作為戰利品，這批首級應該在 22 日晚呈給乍到的西鄉從道親驗，人頭幾何，歷歷分明，豈有計算錯誤之可能。前述西鄉從道與戰事後 5 日內的兩次呈報給蕃地事務局有關石門戰役的報告，都言明斬獲首級 12 顆。日軍三路進擊牡丹社告捷後，6 月 7 日，西鄉從道呈報大隈重信〈蕃地處分大致平定案〉，再次說明 5 月 22 日的石門戰況：「進至石門，生蕃七十餘人盤踞崖門，防禦堅固，我軍奮勇破之，取敵首級十二，受傷死亡者二十餘，據悉牡丹社頭人父子亦於此役中斃命。當日即是從道進港之日」（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31）。雖然重申阿祿古父子死於此役並割取了 12 具首級，但不再重述其中包括阿祿古父子頭顱。

落合泰藏所著《明治七年牡丹社事件醫誌》，記載當時戰況：「最後我海軍砲兵隊由左方山頂迂迴向下射擊，擊斃 7~8 個敵人，步兵第 19 大隊的 1 分隊由右方攀登山峰，包抄夾擊，原住民終於不敵，遺棄屍體 12 具逃走。本道上的我隊也大聲吶喊，終於攻下石門。敵人帶了傷者逃離，路上血痕淋漓。此役我軍傷 10 人，死 4 人。應戰的敵人約 80 人，據說死傷共 30 人」（賴麟徵中譯 1995a），資訊顯係來自參與此戰的日軍，對於馘首 12 具亦無異辭。<sup>19</sup>接獲參軍赤松則良公文，急速從淡水趕赴社寮的水野遵，錯過石門之役，但其回憶錄《臺灣征蕃記》記載該役，亦指出：「以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為始，又取下十二人的首級，待標榜連續捷關三度之後，才慢慢往本營凱旋而去」（林呈蓉譯註 2011: 201, 207）。

沈葆楨奏文稱：「探員晤倭先鋒副島，據稱破生番三社，取首級十二顆，伊兵傷者五十餘人，死者二十餘人。二十六日夜，又被其殺傷五人，死者二人。」<sup>20</sup>這是日征臺軍告知清方日軍割取臺灣原住民首級的訊息，也是 12 具頭骨。1874 年打狗海關

<sup>18</sup> 同日西鄉致海軍上校林清康轉送大隈重信〈雙溪口捕獲兵器清冊事宜〉上載，此戰所獲兵器：弓 7 把、箭 1 束、散箭 11 支、槍 3 把、損壞槍未記數量、刀 3 把、腰帶 6 個，另有物品槍帶 4 個、矛 5 支、矛頭 1 個（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10-211）。

<sup>19</sup> 此外，同時或稍後的記事之作，如津江左太郎《臺清紀事》卷上，頁 11b，言白刃斬虜首 12 級；東條保《臺灣事略》卷中，頁 4b，言斬首 12 級，傷者甚多，包括牡丹社酋長與其親子之首；田代幹夫《臺灣軍記》二編，頁 13-14，言砍首 12 級，傷者甚多，原住民逃入深山，所得首級中，包括牡丹族酋長的首級。

<sup>20</sup> 〈五月丙寅（二十五日）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沈葆楨奏〉，見《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一，頁 27。沈葆楨認為：「官氏所報，生番死者多於倭兵，而倭將所稱，則倭兵死者多於生番，或者留為索價地步，未可知也。」此奏摺中的先鋒副島，應為先發部隊福島九成參謀，前述西鄉〈蕃地處分大致平定案〉即言，「福島九成目前已前往台灣府與鎮臺、知府、知縣、海防委員等諸官員會面應對」（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31），時間與死傷數量與他載不符，而馘首數目則同。

報告，指出日人在 5 月 22 日傍晚與原住民遭遇，日人 2 人喪命，3 人受傷。次日上午，日軍集結 200 人進軍，與原住民進行遭遇戰，日軍有 6 人喪命，30 人受傷；日軍於傍晚返營，帶著“the gory heads of twelve savages”，據聞有 30 名原住民死於該戰（Edgar 1875），雖然所記事件發生時日有誤，所偵知的，想必也是當時獲自日本軍方的情報。

## 二、馘首 16 具說

日軍馘首原住民的數量，軍方定出 12 具的公版。然而，當時身在大營的美國工兵中尉華生有不同的記述。華生於 1875 年在東京撰寫呈給蕃地事務局長官大隈重信的長篇報告中說明了石門戰果，<sup>21</sup> 提到原住民 16 人死亡，有相當數目的人受傷，之後得知其中有 14 人死亡，死亡並遺留在戰場上的屍體包括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的兒子，而阿祿古身受重傷，隔日死亡（Eskildsen 2005: 236）。華生並沒有指明日軍將遺留在戰場的屍體馘首，但明確地指出戰場上遺下 16 具屍體。當時隨軍記者 Edward House（豪士、豪斯、赫斯）的記載更為明確：在持續一個多小時的槍戰後，原住民不支，匆忙帶著受傷同伴逃走，「戰場留下 16 具生番的屍體，當場被日兵割下首級，帶回營區報功、領賞」（豪士 2015: 105）。另外，大倉喜八郎於 1926 年（時年 90 歲）受訪回顧談，言及石門激戰，日軍大捷，獲原住民 16 名頭顱，以其長頭髮綁吊在竹竿上，帶回供都督實檢。其時，頭顱已乾，為大倉親見<sup>22</sup>（藤崎濟之助 1931: 609）。

豪士未親歷戰事，所記必得諸訪問與戰軍兵，大倉喜八郎回憶自謂「實見」日軍帶回原住民頭顱，其狀態都有所描述，難以言其無據。華生為征臺軍顧問，與聞軍事行動與戰況戰果，其對蕃地事務局長官的報告應力求正確詳實，並且該報告是在事件落幕後回到東京，撰寫呈給征臺事務最高長官的總結報告，存在對軍事行動時部份錯誤資訊進行修正的可能。臺灣研究通學伊能嘉矩亦指出，石門戰役原住民敗退，現場遺留 16 具屍體，日軍盡斬取首級（梅陰生 1906）。

## 三、其他諸說

日軍馘首原住民的數量除 12、16 具之說外，親身參與此戰的佐久間左馬太於 1906 年回憶此戰，「蕃人不能當，狼狽逃去，遺屍十八具。自是既登溪右之一隊，欲進扼蕃人之歸路，在此處大獲勝仗，因梟其首級」（不著撰者 1906a）。再添一說。<sup>23</sup>

<sup>21</sup> 日方死亡 6 人，約 30 人受到不致命的槍傷，而“The loss among the savages was considerably greater; sixteen killed outright and a large number wounded; of the latter we learned afterward that fourteen died. Among the killed and left on the field was a son of Ahluk the chief of the Boutans, who was himself mortally wounded, so that he died the following day”（Eskildsen 2005: 236）。

<sup>22</sup> 「生蕃十六名之首を刎ね、其首を物乾しする如く、頭髮（生蕃は頭髮を長くしてゐた）を以てずらり竹竿に吊るし、都督の實檢に供したが、自分も之を實見した」。

<sup>23</sup> 林呈蓉（2006: 97）記載：「以遠征軍最初在四重溪行進時曾遭原住民從樹叢中襲擊為例，當時遠征軍殺了

當時隨軍的另一美籍顧問克沙勒對於日軍冒進，導致石門戰役的發生，破壞其研擬的利用石門地勢，誘敵於此再派騎兵迂迴至其後方可一網打盡原住民計畫，十分憤怒。在石門戰後第二天，呈給李仙得信函中，報告了他所知的石門戰果，「斃敵十五人，傷敵三十八人，我軍亦有六人死亡，十或十五人負傷。得知此事時，余憤忿之情莫可言喻，加之我軍斬敵十二首級提回陣營時，此村所有清國人皆言牡丹社酋長『阿洛克』之首級亦在其中」<sup>24</sup>（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45）。依此報告，克沙勒所獲石門戰役訊息，日軍當場擊斃原住民 15 人，但只割取 12 具首級。在此，可能須釐清擊斃原住民、遺留在戰場的屍體、被斃首等三個不同數字。

以被斃首數目而言，12 具之說出自即時戰報，應是征臺日軍石門戰役後不久的一段時間內認定之數目，也是日方告知清廷的數字；之後，是否軍方數字有所修正，有待未來細予查究。16 具之說出自當時與聞軍密的外籍顧問、隨軍記者、御用商人的記載回憶，有其依據，且是呈給征臺最高長官的數字，較軍方早期版本或更為可信。18 具之說，出諸與戰指揮官之回憶，當亦有所本，但或許佐久間記憶失準、報章誤繕錯刊文字的可能性大，暫不採信。

西鄉從道在 5 月 22 日石門戰役當日以及 26 日兩日發給蕃地事務局報告均指稱，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均在被斃首之列，此一看法當是來自當地漢人與當地諸社頭目指認以及依據被斃首者身上的佩飾，但也未始沒有誇大戰功可能。但顯然此一傳言並不正確，可能在之後傳出阿祿古在戰役中重傷，於隔日死亡，日軍才確認並未在戰場上割下敵方頭目首級，是以西鄉從道在前引 6 月 7 日〈蕃地處分大致平定案〉報告中僅模糊地稱：「據悉牡丹社頭人父子亦於此役中斃命」。表明西鄉從道已經知道或懷疑被斃首的原住民中，並不包括阿祿古，而阿祿古之子則應是在戰役中當場被斃首。

## 參、為何日軍砍下原住民死難者頭顱？

日軍在石門戰役中，砍下原住民死難者的首級，以首級上的頭髮<sup>25</sup>綁吊在竹竿上攜帶回營（參見圖 3），行徑如同被其鄙視為野蠻人的獵頭暴行，在當時引起一些批評與不同意見。在前述呈閱李仙得有關於其近期所為及成就的信函中，克沙勒對於日軍

原住民十七名，戰事結束後，他們將死去原住民的首級割下，用首級上的毛髮固定於青竹上，再命軍夫抬回本營。」指出日軍割取了 17 具首級，未詳何據。此外，《申報》1874 年 6 月 6 日，〈臺灣近日交鋒情形〉轉述《香港西報》傳述四月十二日從廈門寄來信札提及，東師其徒以「番首十一級並獲弓箭矛銃多件而歸營」（西里喜行 1989: 168）。

<sup>24</sup> 李仙得將克沙勒所寄的私信抄錄寄給大隈重信，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イ 14 C0453）。

<sup>25</sup> 大倉喜八郎回憶、林呈蓉（2006: 97）所記，都說是以頭顱上的頭髮綁繫在樹枝上；佐久間左馬太回憶則為以原住民使用的火繩綁縛（見不著撰者 1906a）。

表現的野蠻行徑相當不滿，「我軍斬敵十二首級提回陣營時，此村所有清國人皆言牡丹社酋長『阿洛克』之首級亦在其中。日本人仿效彼恐怖野蠻之作風，斬取死者及負傷未死者之首級作為戰利品，掠取蕃敵之兵器及裝束回營。」（黃德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45）也許還有其他日軍或外籍從軍者予以責難，所謂「當時衆口囂囂，謂為亂暴者有之，謂為非文明者亦有之」（佐久間左馬太語）（不著撰者 1906a）。並且此一行為，亦在當時的國際媒體<sup>26</sup>上有所評論。



圖 3：落合芳幾繪石門戰役圖，《東京日日新聞大錦》（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引自：<https://dl.ndl.go.jp/pid/9369959/1/21>）

4月25日，在日軍先發部隊出發前二日，西鄉從道發布日皇論文，要求日軍「不能專事討伐而傷害無辜人民。此次征討之主要目的是使他們懷德畏威，教化他們脫離野蠻的陋習，成為良善的人民，過現代化的生活」（賴麟徵中譯 1995）。5月2日，參軍陸軍少將谷干城發布通告，第一條要求：「此次征討臺灣……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於皇上希望用恩惠等柔和手段，使他們來歸附。大家應該謹行皇上的旨意，對原住民不得有不尊重的舉動，即使是戰鬥中也不應該對他們有殘忍苛酷的行爲」（同上引）。

<sup>26</sup> “It is a little unpleasant to learn that the Japanese cut off and carried away the heads of their dead enemies; but then they have only had, at most, ten years of European culture” (Anonymous 1875)。

海、陸兩參軍更於5月10日有告前線軍士曉諭書，其中第四條規定：「對當地人有殘酷行爲、苦役敗者、凌虐老少、姦淫婦女等者，應處以相當之刑責。」（黃德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87）既然如此，爲何當時已戰勝的日軍要割取敗戰者頭顱，是有戰場上官下令，還是軍兵自發行爲？

擔任李仙得秘書的隨軍記者豪士，在其《征臺紀事》中處處毫不掩飾地頌揚日軍，爲其抹粉。該書第16章〈殖民兵〉有如下的記述：「西鄉都督嚴令不准再發生割取敵首的行爲，但斬取敵人首級自古以來一直是日本的野蠻遺風，很難禁止。所以牡丹人再度出草，又引發薩摩兵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的報復行爲。」又云：「殖民兵大部份來自薩摩，……他們熱心追求戰功，……完全不聽上級的命令，也不管軍官是否跟上隊伍，腦袋只有砍下敵人首級、建立功勳這個念頭。」他並舉一位親友涉入「佐賀之亂」的翻譯員爲例，爲洗刷清白、表忠報效國家，聞石門開戰，直驅前線，當晚帶回3具首級（豪士 2015: 120-122）。

或許某些日軍確有如豪士所言，將戰場留下的原住民屍體割下首級，帶回營區報功、領賞之意（豪士 2015: 105）。前引大倉喜八郎於事件50年後的受訪回顧，直言親見軍士帶回原住民頭顱，供戰役當晚抵達的西鄉從道親自檢驗，當然不無向乍到的最高長官邀功之意。<sup>27</sup>另據楊南郡譯註《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意見，戰勝者將戰敗者首級收集於木桶內，在主將面前逐個取出識別，稱之爲「首實見」，乃日本古俗（鳥居龍藏 2016: 312）。

若以當時現場指揮官佐久間左馬太就任臺灣總督兩個月後的回憶自白：「在此處大獲勝仗，因梟其首級，以若輩所用火繩，縛諸樹枝，持之而歸。吾輩斬蕃人之首級，當時衆口譁譁，謂爲亂暴者有之，謂爲非文明者亦有之。吾輩之所以如此處分者，亦以對蕃人之方法，不得以其所爲者還加諸其身，若以此爲惡，則吾輩亦甘受之也。所可幸者，以兇蕃之首級持之歸營，該處之人見之，咸以爲如彼兇猛之牡丹蕃，日本猶能斬殺之，則其勇敢當不知如何也。於是附近之人民，其對我軍之態度，翻然一變，而有多少之異，是吾輩之取其首級，於對彼漢民並蕃民，其效能不少也。」（不著撰者 1906a）由此論述，似乎可以推測石門戰役，日軍割取戰死遺留現場原住民的首級，不僅是基層士兵或某些薩摩武人的邀賞舊習，亦不無有高層軍官的默許或甚至授意，目的在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即便原初沒有震懾原、漢人民之意，卻也獲得如斯效果。

<sup>27</sup> 林呈蓉（2006: 97）也認爲，臺灣遠征軍「仍強烈地存有前近世時代以首級計算戰功的概念，所以無論日軍高層如何地三令五申要求下屬必須保持敵人屍體的完整，然而下層的士兵仍習慣割取首級以求軍功。」

## 肆、現存牡丹社人頭顱特徵與受創及保存狀態

旅日美籍醫生 Stuart Eldridge 於 1877 年 3 月 14 日在日本亞洲學會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晚會上宣讀其對 4 具牡丹社人 (Botans, Motans) 頭骨的體質測量報告，此報告在日本亞洲學會的會刊上發表 (Eldridge 1877)。這是第一次出現對牡丹社人被馘首頭骨的相關研究，也是第一篇對牡丹社人體質測量的資料。<sup>28</sup> 但可惜的是，此報告並沒有說明這批頭骨的來源，也沒有說明是否有其他頭骨存在。此篇報告也沒有詳細檢查這批頭骨的病理與傷損，僅提到只有一具完整 (No. 1)，其他三具則都有創傷：二號頭骨失去左側顴骨 (zygoma)、一部份額骨 (frontal)、一部分顳骨 (temporal bone)、篩骨 (ethmoid bone) 體部，以及幾乎一半的顏面骨 (facial bone)。三號頭骨失去約一半的額骨，並且有廣泛性的骨折。四號頭骨的兩側頂骨 (parietals bone) 的上部邊緣受到撞擊凹入。

根據 Eldridge 的測量與觀察，這四顆頭骨都是長顱型，各處附著肌肉與韌帶的乳突發育都很強韌，都沒有人工的頭骨變形。雖然其觀察的印象，牡丹社人種為 Negrito 與蒙古人種的混種，但 Eldridge 認為分類定位需要廣泛的比較與特殊經驗與訓練，自承並不具備這些條件，無法給予牡丹社人頭骨合適的分類。在此報告，他只是研究並測量所擁有的材料，以提供專業的頭骨學者比較與知悉標本的所在 (Eldridge 1877: 162-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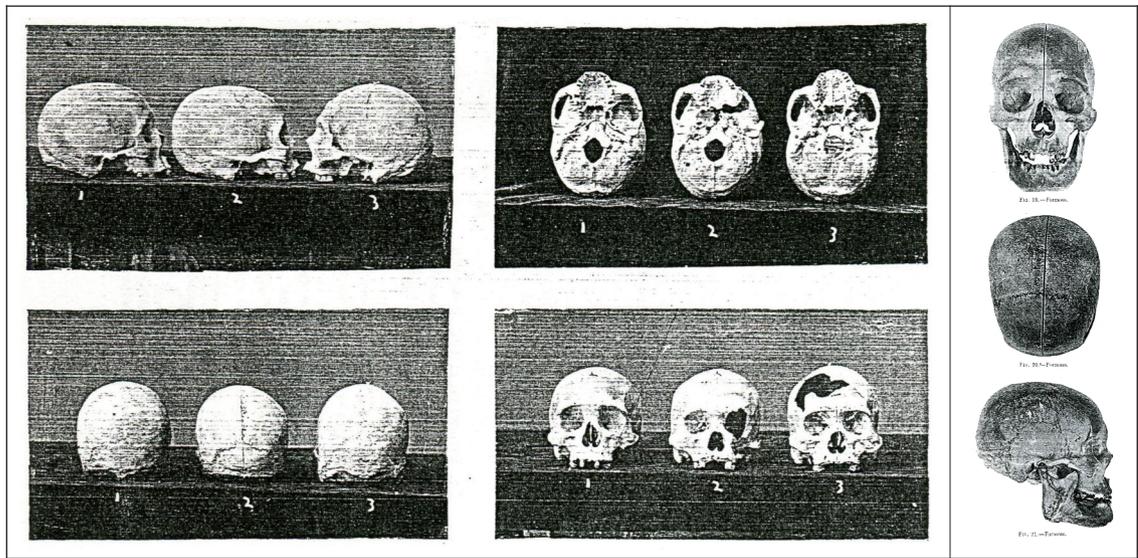


圖 4：牡丹社人現存的頭骨。分別引自 Eldridge (1877) (左) 與 Turner (1907)。

<sup>28</sup> 一共提出 57 項測量。

也許正因為 Eldridge 自知其缺乏足夠的訓練與經驗，也沒有廣泛的比較標本，無法正確給予牡丹社人頭骨合適的分類，有意提醒並將之交付給合適的學者研究。Eldridge 曾將其論文寄交 *The American Naturalist*，該刊為之刊出測量資料的節要 (Mason 1878)。Eldridge 也將其論文中頭骨照片寄給美國陸軍醫學博物館 (Army Medical Museum)。

30 年後，愛丁堡大學解剖學教授 William Turner 延續其從 1899 年開始的亞洲人種的頭骨測量分析，於 1907 年 6 月 10 日愛丁堡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發表其包括婆羅洲、馬來、臺灣與西藏土著頭骨的測量研究 (Turner 1907)，該文中臺灣的頭骨正是 30 年前 Eldridge 測量的這批頭骨。

在該文中，Turner 對這四顆來自牡丹社 (Botans or Bootangs) 的頭骨提供如下的保存狀況與創傷觀察：

- 一號<sup>29</sup>、二號頭骨有下顎骨<sup>30</sup>；
- 二號頭骨失去一部份額骨 (frontal) 與蝶骨 (sphenoid) 以及大部分的左側顏面骨；
- 三號、四號頭骨帶有傷痕與劍砍的痕跡，並且沒有顏面骨。

除此之外，Turner 並提出對這批頭骨的體質特徵觀察，指出：

- 1、這四顆頭骨的主人都值盛年；
- 2、枕骨隆突 (inion)、枕骨項線 (occipital curved lines)、乳突骨 (mastoids) 等部位具有男性特點；
- 3、這四顆頭骨彼此尺寸、形貌十分相近，顯示有很強的種族或甚至家族關係；
- 4、其牙齒都為檳榔染色，臼齒在咬合面使用的較平。

Eldridge 與 Turner 都指出有的頭骨受有劍傷與左側顏面傷損。但石門激戰當時，日軍在四重溪中，原住民在「巖石盤疊之地」，相距 24-26 公尺，雙方以槍枝<sup>31</sup>互擊，並未短兵接戰，<sup>32</sup>最後，日海軍砲兵隊由左方山頂迂迴向下射擊，擊斃 7-8 人，步兵第 19 大隊的 1 分隊由右方攀登山峰包夾，原住民不支退去 (賴麟徵中譯 1995a)。落合泰藏所記此日醫誌，記載此役日軍即死 4 人，負傷 10 人，9 人槍傷，1 人銃傷 (賴麟徵中譯 1995a)，沒有一個是近身接戰的刀矛傷。

<sup>29</sup> Eldridge 與 Turner 的編號應該一致。

<sup>30</sup> Eldridge 並沒有指出有兩具頭骨尚存下顎骨。

<sup>31</sup> 原住民使用的是舊式火繩槍，不比日本獵人使用者佳，其彈藥並非鑄造，而是用鐵錘一個一個打成直徑 1 公分的彈丸，見賴麟徵中譯 (1995a)。

<sup>32</sup> 華生 1875 年的報告說明，石門戰役日軍所受傷都是槍傷，顯示原住民很倚賴火繩槍戰鬥 (Eskildsen 2005: 236)。



圖 5：日本當時報導石門戰役不存在的交戰圖，大蘇芳年 1874 年繪「牡丹征伐石門進擊」  
 (引自：<https://archive.library.metro.tokyo.lg.jp/da/detail?tilcod=0000000003-00220884>)

馘首自然是以利器將首級切砍下，在頸椎部份或接近頸椎的頭骨、下顎骨區域受有劍創並不意外，如是雙方並無近身戰鬥，現存牡丹社人頭骨上的劍創因何而來？若依前引克沙勒呈給李仙得的報告所述，「日本人仿效彼恐怖野蠻之作風，斬取死者及負傷未死者之首級作為戰利品」，這些劍傷是否是日軍施加在無力接戰的死亡或負傷的原住民頭上，如 Eldridge (1877) 指出的，傷損嚴重的三具頭骨很明顯受到日本刀劍硬度與銳利的「實驗」。<sup>33</sup>

這四顆頭骨的體質特徵與創傷鑑定，當可就迎回頭骨再予檢視。至於被馘首的原住民體骨所在，依據落合泰藏在其回憶錄（落合泰藏 1920: 77）所載：在石門戰役中，獐猛的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死亡，但一些成書往往有阿祿古父子被我軍斬首的記載，此與事實不符，阿祿古屍體與其他戰死者共同埋葬於蚊阿社，<sup>34</sup>我軍從琅瑤退兵之際，將之改葬於石門口並建碑，至今猶存。日清戰後，臺灣屬我領土，天皇賜下祭祀經費，為期許大志氣頑強抵抗也。此說確實與否以及其可能的埋葬地點，應作為未來調查研究的努力目標。

## 伍、牡丹社事件服役或與日軍同行的歐美人以及牡丹社人頭骨的流傳

<sup>33</sup> “apparently served for experiments as to the hardness and sharpness of Japanese swords.”

<sup>34</sup> 未詳是否即蚊蟀社。

目前所知僅存有四顆流外的石門戰役牡丹社人頭骨，他們是被誰收存，如何從臺灣流到日本，成為留日美籍醫師 Stuart Eldridge 的研究材料？得以將頭骨攜出臺灣者，不脫 1874 年從役臺灣的各色人等，並以西方人較為可能。

李仙得於東京在 1874 年 3 月 13 日呈大隈重信參議第 22 號備忘錄，目的在為日本政府擘畫征臺並佔領「土著」之地。備忘錄之一〈論掠奪生蕃地後置統轄官、訂定其權限並施行政令事宜〉明確指出：「遠征之真正目的雖然在於日本兼併土著所轄之臺灣島一部分，但表面上應著眼於僅僅問罪牡丹社人，並防止其將來再造惡業而已。」「征服牡丹社人或其投降後，日本政府再平定臺灣島。」備忘錄之二〈論採用外國人之方法及賦予克沙勒少校等級與訂定薪俸事宜〉，認為若能以誠懇之心準備工作，且能在人員編成後月底出發，估計在 5 月底前遠征軍可紮營於社寮，且可於東海岸佔據三處地方，不久將由日本兼併臺灣島原住民之所有領地，為達此目的，他建議日本政府聘用包括他在內的數名歐美人，各賦予其任務，並提供相應的職稱與薪資（見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07）。

李仙得於東京在 1874 年 3 月 31 日呈西鄉從道第 23 號備忘錄〈論各艦啓航順序及李氏等外國人之進行方式〉，對前述 22 號備忘錄建議的謀略提供細部執行方式。建議速將克沙勒少校要搭乘之船（最好是コルロタ，適合在東海岸執行所定計畫）送至廈門，接萬巴德醫生<sup>35</sup>前往社寮，並僱用布朗或其他技巧熟練者；之後要航往卑南，設置軍事殖民地；李仙得本人則與西鄉及附屬軍官於 4 月 18 日搭紐約號出發，28 日抵達社寮，建設軍營並於山谷處建造堡壘；李仙得並自命承擔設法在社寮令混血人種及統治豬勞束社土人協助討伐牡丹社之任務（見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10）。

彙合各種資料，1874 年牡丹社事件前後，服役日本、與日軍同行或繼至來臺與日本征臺戰役有關的歐美人，<sup>36</sup>有美籍李仙得將軍、海軍上校克沙勒、工兵中尉華生、充當李仙得秘書的隨軍記者豪士、充當翻譯的華裔美人詹漢生（James Johnson）；另外還有英籍布朗船長，<sup>37</sup>以及於 1874 年 7 月 15 日日本天皇特聘來到臺灣為原住民地

<sup>35</sup> 萬巴德（Patrick Manson，曼遜），李仙得原希望萬巴德與克沙勒配合至卑南之地，稱其「通曉東海岸土人所用之漢語方言，故用此人時，不僅是為最高委員、凱塞上校，或是我本人，皆有無法估計之利益。」見李仙得於東京在 1874 年 3 月 13 日呈大隈重信參議第 22 號備忘錄〈論採用外國人之方法及賦予克沙勒少校等級與訂定薪俸事宜〉（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07）。此外，李仙得在該信中另要求日本政府專屬配給一日本通譯官、一清國通譯官，以及一名外國書記官。

<sup>36</sup> 克沙勒 5 月 26 日所寄函件指稱，隨西鄉從道前往附近村落，與諸頭目會面者，有赤松則良、泰涅、克沙勒、華生、布朗、豪士及通譯官二三人（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46）。其中泰涅未詳何人，經查原信作“General Tainei”，實為陸軍少將谷干城。

<sup>37</sup> 布朗（Albert Richard Brown）生於 1839 年英國 Hampshire 的中產家庭，從小就極喜閱讀航海有關書籍，15 歲開始就已在西印度群島的貿易船上學習，並在其 18 歲生日時成為正式船員，受僱於英國當時最大船運公司 Duncan Dunbar & Company，搭乘 Violet 號前往印度半島（孟買、加爾各答等）、巴達維亞。在後續輾轉於不同船隻，往來東方諸港船運過程，逐步晉升，並在其 26 歲生日時，加入 P. & O. Company，為 Malacca 號大副，服務於上海來往香港的海岸服務與遠東、東南亞及南亞的郵運工作。1866 年末，Malacca 號首次來到日本長崎與橫濱，布朗對日本頗感興趣。1868 年末，Malacca 號再到橫濱，布朗遇到當時受聘在日本各海岸建立燈塔的英國技師 Richard H. Brunton，受邀擔任運輸建造燈塔材料與機械新造／購船隻的船長。

區服務的德籍醫師 Dr. Gustav Schoenberger<sup>38</sup>（賴麟徵中譯 1995a）等。若根據 Eldridge（1877）與 Turner（1907）所述，這四顆頭骨最早的收藏者為美國軍官，直接轉由 Turner 好友交致，但不能完全排除其間是否是經由他人再轉手給 Eldridge，或是否有其他頭骨亦運至日本。此節對較可能涉及牡丹社人頭骨流動與收藏的幾位美國軍官的相關事蹟，略作說明。

### 一、李仙得（李仙德、李讓禮、李尚禮、李贊達、李珍大、李全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

前引李仙得備忘錄可見，李仙得為日本政府籌劃侵臺可謂盡心竭力，<sup>39</sup>目的之一可能為彌補數年前羅妹號（*Rover*）船難美國用兵南臺未果之遺憾。但駐日本東京美國公使 John A. Bingham 於 1874 年 4 月 18 日致函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對日本僱用美國船艦、人民進行對臺海陸征討表達疑慮；該日 Bingham 並與寺島宗則就「臺灣事件」進行晤談。19 日致函，更明確告知，在日本政府未收到清政府同意日本出兵信函之前，禁止日本政府僱用的美國紐約船及國民三人（李仙得、克沙勒與華生）前往臺灣<sup>40</sup>（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42）。時在長崎的李仙得很快就收到美國公使所致信件，並於 4 月 25 日即由大藏卿大隈重信轉陳覆函（同上引: 144）。在 4 月 27 日大隈重信致李仙得信，表示日本政府已充分告知李仙得等三人美國的立場，並在信中說明美國公使致克沙勒與華生二人的信函由福島氏於北海丸中分別送達（同上引: 146-147）。

識趣的李仙得即通知克沙勒與華生，要求二人書面回覆；二人說明以附件見於李仙得於隔日回覆大隈重信的書信，三人說明大意相同，皆謂 Bingham 所提異議，為美

開啓布朗之後為日本服務的 20 年生涯，為日本建造燈塔、測量海圖、教育造船與海事相關學生（Bush 1969: 9-23）。航海技術十分純熟的布朗，在日本政府於 1870 年購買 French paddle steamer *Thabor* 號後，便成為該船船長為日本軍方服務（Bush 1969: 26-27, 61），並為克沙勒選中為其往卑南殖民船隻的最佳選擇（Eskildsen 2019: 230-231）。

<sup>38</sup> Schoenberger 相關事蹟資訊尚未查得。據落合泰藏《明治七年牡丹社事件醫誌》，7 月 5 日，日本天皇特使搭高砂丸入港，攜來天皇敕諭，有云：「此次特聘德國醫生 Schoenberger，希望互相瞭解。」「茲聘派 Schoenberger 醫師在原住民地區服務。」7 月 15 日，Schoenberger 顧問搭猶龍號自長崎來臺，與院長及西鄉從道一起巡視病房，準備接管醫院（賴麟徵中譯 1995a）；隨行的有海德堡大學醫學博士赤星研造（1844.02.05-1904.01.06），見國立公文書館藏「外国医并赤星研造同上（北条侍從蕃地へ差遣）」6 月 18 日文書（<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meta/A01000074500>）。如前文，7 月中旬之後，日軍爆發瘧疾，克沙勒可能亦於此時染病，在其於陽曆 10 月 8 日因病搭船離開臺灣前，有可能接受 Schoenberger 醫生的診治。

<sup>39</sup> 李仙得為日本征臺學畫用力甚深，日本政府感謝其貢獻，明治天皇兩度詔勅嘉獎。明治 7 年 11 月 15 日〈臺灣辦務使支那人李仙得へ敕語〉：「汝我國事のため久しく派して清國に在り大に我國に裨益めり今安全歸朝す朕甚た之を悦ぶ」、明治 9 年 4 月 6 日〈支那人李仙得へ敕語〉：「汝日に臺灣蕃地の舉より清國と談判結局に至るまで一方ならず拮据勉勵其其勞少からず朕甚た之を嘉みす」，見福田滋次郎（1910: 65, 78）。

<sup>40</sup> 因應日本征臺事件，對於服務其他國家軍隊的美國國民，美國國務卿 Hamilton Fish 於 1874 年 7 月 29 日給駐北京代辦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信函，說明美國立場，基本上是，法無不許，政府不禁，若服務於兩交戰國者戰死不論，但被俘者須受人道待遇。見 House and Senate Documents, 1634 H. exdoc: Foreign Relations, 1874, pp. 300-301。是以未詳駐日美國公使 John A. Bingham 於 1874 年 4 月中極力反對李仙得等三人涉入日本征臺戰役是個人意見，還是未獲如衛三畏所得之明確指示。

國公使與日本政府間之事件，所收信為 Bingham 表達其意見而已，三人並不受其限制，或不認為 Bingham 有妨礙其之權力，不予置評或不予理會（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47-148）。然而大隈重信仍希望解決美國公使 Bingham 所提出的要求，暗示（30 日信件）李仙得在與西鄉從道商議後，返東京與 Bingham 見面，消除其疑慮（同上引: 149）。在接到李仙得 30 日說明信件後，西鄉從道同意李仙得返東京處理，但要其暫停一、二日，待大久保利通到後再啓程，而克沙勒、華生已於 29 日搭乘有功丸從長崎出發航向廈門。5 月 4 日，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與西鄉從道在長崎決議，西鄉抵達臺灣後解僱克沙勒與華生二人並儘速遣返，李仙得搭最近船次回東京，「生蕃處分」若釀成事變，應解僱英國人及其他人等之職，交還船艦（同上引: 151）。

在此同時，英國公使巴夏禮（Harry S. Parkes）亦於 4 月 16 日詢問日本征臺真意為何？在發現 4 月 29 日日本輪船有功丸搭載軍隊與二名美國軍官自長崎航向廈門後，於 5 月 5 日致函寺島宗則，在清政府公開聲明同意此舉措前，不同意僱用英國船艦或人民（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53）。萬巴德原在廈門待命要與日本先頭部隊會合，但因英駐廈門領事警告，萬巴德退卻，匆促返英（豪士 2015: 50）。而李仙得因此受阻，並未實際踏上征臺之路，這四顆頭骨自然不可能為其所得，再轉交予 Eldridge。

## 二、克沙勒（侗响刺斯、甲世爾、哥塞兒、克些耳、克斯爾、加賒美、克色里、日格塞爾、機慎、カスセル）（Douglas Cassel, 1846-1875）

根據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網站登載美國西元 1798-1900 年海軍官員資料，<sup>41</sup> 1860 年 9 月 28 日克沙勒為見習軍官（Acting Midshipman），1863 年 10 月 13 日成為代理海軍少尉（Acting Ensign），1866 年 3 月 10 日為 Master，1866 年 7 月 25 日為中尉（Lieutenant），1868 年 3 月 12 日，晉升為海軍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之後，並無官階資料，死於 1875 年 6 月 15 日。

克沙勒少校 1871 年 6 月曾服役於美國征朝鮮遠征艦隊，<sup>42</sup> 在攻擊陣列後方負責指揮火炮（Tyson 2007: 22）。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幅「車城下錨點」圖（圖 6），為西曆 1872 年 3 月 2 日侗响刺斯（Douglas Cassel）所誌，載明南北方，海底為砂質與珊瑚，陸上有高峰，圖左側記有「大日本海軍水路寮第三拾三號松田保信鑄」。於此可知，克沙勒在 1871 年 6 月美軍征朝鮮戰役之後不久，於隔年 3 月即到訪、調查臺灣南端可下錨地點，此時克沙勒仍為美國海軍軍官，所測繪圖資不知何以流入日本海軍。

<sup>41</sup>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online-reading-room/title-list-alphabetically/o/officers-continental-usnavy-mc-1775-1900/navy-officers-1798-1900-c.html>（2024.06.30 搜尋）。

<sup>42</sup> 1866 年，美國商船 *General Sherman* 號駛至平壤，船員靠岸後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有部份船員被殺害，美國追究此事，於 1871 年 6 月派亞洲分艦隊（Asiatic Squadron）艦隻攻打江華島，並派軍登陸，韓國史上稱為「辛未洋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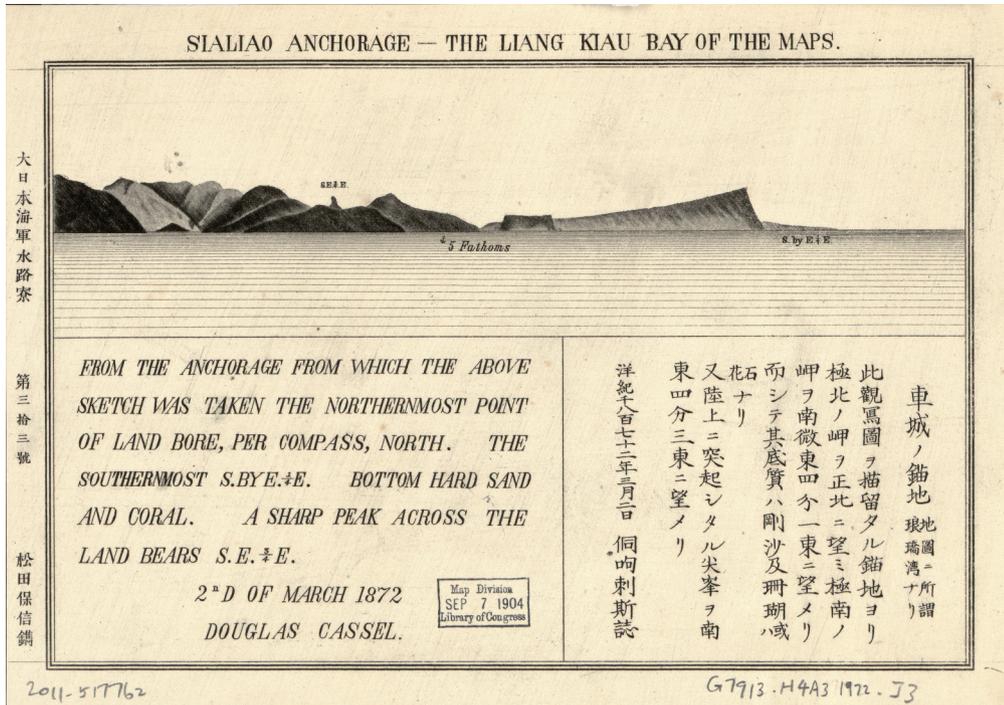


圖 6：「車城ノ錨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G7913.H4A3 1872.J3）  
 （引自：<https://www.loc.gov/resource/g7913h.ct003820/>，2024.06.06 搜尋）

克沙勒顯然具有測繪觀察海岸地形的能力，並且嫻熟海軍事務，受李仙得賞識，認為克沙勒是可勝任在臺灣東岸選擇適當場所設置軍事殖民地之人物，向大隈重信參議推薦，並建議其當敘較高的軍銜與薪水，<sup>45</sup>日本政府同意以海軍准將銜聘僱，克沙勒則以在原職一年休假的方式受聘。但如前述，美國駐日本公使 John A. Bingham 於 1874 年 4 月 19 日致函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說明美國在收到清政府同意日本出兵臺灣計畫之前，將拒絕日本政府將美國船隻與國民送往臺灣，其所言之船隻為紐約船，國民為李仙得、克沙勒與華生（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42），但克沙勒決定不予理會。

1874 年 4 月 27 日，克沙勒、華生與先發部隊從長崎出發，經廈門於 5 月 6 日晚間抵達臺灣。華生主要負責選址設置營地，克沙勒則挈帶翻譯負責撫安附近原住民，以孤立牡丹社與聯盟諸社，曾主持數次與附近原住民諸社頭目的會議綏輔，實際承擔

<sup>45</sup> 李仙得於東京在 1874 年 3 月 13 日呈大隈重信參議第 22 號備忘錄〈論採用外國人之方法及賦予克沙勒少校等級與訂定薪俸事宜〉，建議：「為使該人執行職務，應將日本海軍軍官所搭乘之船一艘供該人指揮，該船則依照該人所需而運作。且為選擇軍事殖民地而上陸時，該船所載之陸軍軍官等亦應依照該人之要求行事。……該人之薪俸每年應比華生中尉多一千美元，且上陸時亦准照此原則，其津貼亦要增加，如此也絲毫不過份。」（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07）在前引李仙得 23 號備忘錄〈論各艦啓航順序及李氏等外國人之進行方式〉中建議克沙勒與萬巴德醫生在卑南設置軍事殖民地，並觀察貿易可能的發展，並數度提及，克沙勒少校的「忠告書」，包括須僱用的船艦、對船上工作技巧熟練的外國人、初登陸應建造的堡壘等（同上引: 110-111）。

原規劃由李仙得負責說服原住民的工作。同時，福島九成<sup>44</sup>參謀與克沙勒及華生商議，也完成租用軍營土地的談判（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85）。

克沙勒原擬定誘敵石門殲敵其後的戰術，但以5月22日因日軍冒進，爆發石門戰役而不果行。日軍三路進剿牡丹社，西鄉於6月2日由琅琊本營至石門，與正好到達的克沙勒、華生、豪士一同前進牡丹社地；6月4日上午，西鄉為首，與克沙勒、華生及隨行諸官回營（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27-228）。

7月中旬之後，日軍爆發瘧疾疫情（賴麟徵中譯 1995a），克沙勒亦不幸染病，性命危急，故於1874年10月8日先行離臺，<sup>45</sup>回到日本，其行囊中可能攜帶牡丹社人頭骨。克沙勒離臺首站應該是長崎，應該在隨後不久，克沙勒轉至橫濱，住宿 International Hotel，並寄信給大隈重信，報告他的行止，大隈於10月25日回信，希望他早日康復並承諾儘快約見他。<sup>46</sup>11月15日，日本天皇特頒敕語嘉獎：「汝向に蕃地に入り險を冒し身を苦め功勞不少遂に病に罹るを聞く今恙なく歸朝す朕甚た之を悦ぶ。」<sup>47</sup>

1874年11月，清日和議，日軍退兵，克沙勒接獲大隈重信於11月19日來信，要求他即刻前往臺灣向西鄉報到，<sup>48</sup>但在離開橫濱前未及趕上前往臺灣的船，他於21日趕抵神戶，但高砂丸已然離港，<sup>49</sup>24日到達長崎，發電報給大隈重信請求新的指示。<sup>50</sup>在得知大隈仍希望他前往臺灣時，克沙勒搭 Tamaura maru 在12月7日抵達琅琊，但當時大營日軍已於二日前撤離，克沙勒隨即離開並於12月13日抵達長崎，於12月27日寫信報告他已回到橫濱。<sup>51</sup>

- <sup>44</sup> 日軍先發部隊登陸時，原本克沙勒與福島九成一同上陸，此時，克沙勒請福島九成獨自先行上岸，並賀以大日本帝國著手蕃地之先登者。對此，福島在5月16日呈給大隈重信的報告說：「不亦快哉」（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75）。但不過數日，克沙勒5月24日寄給李仙得的私信，起頭即明言：「首先不得不言，與福島甚難相處，其實彼掌握過多實權，余歷盡辛勞，始得以執行所奉指令，故余今後不論如何，絕不願再與彼共同從事任何工作。」（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41）
- <sup>45</sup> 《明治七年牡丹社事件醫誌》10月8日載，該日步兵第19大隊搭「金川號」輪船回日本，有醫療人員隨船護送（賴麟徵中譯 1995b），但沒有指明克沙勒在船上。另據〈九月戊午（十九日）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該營疫氣流行，死者日四、五人，病者不計其數。……美國人機慎者月得工錢一千圓，為入牡丹社繪圖，亦病危而歸。」（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9: 166-167）又〈十月壬辰（二十三日）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查八月二十三日（1874年10月3日），倭營到輪船一號，……於二十八日駛歸，內載病兵七百餘人，小工三百餘人，花旗人機慎亦在其中。」（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9: 197）以此，克沙勒當於陽曆10月8日搭「金川號」輪船離開臺灣。
- <sup>46</sup> 見「カッセル帰着二付大隈殿ヨリ同氏へ書翰」，國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以下簡稱 JACAR）Ref. A03030019700。
- <sup>47</sup> 明治7年11月15日「米國人甲世爾へ敕語」，見福田滋次郎（1910: 65）。
- <sup>48</sup> “Instructions to join the forces in Formosa”，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大隈關係文書（イ 14 C0171）。
- <sup>49</sup> 克沙勒在神戶發出電報（國立公文書館藏，JACAR Ref. A03030011600）給外務次卿平井希昌（Hirai Kisho），說明“Dispatches for Formosa did not reach me before leaving Yokohama. can they be telegraphed me at Nagasaki have sent letter to 16<sup>th</sup> Okuma. answer me here or at Nagasaki remain here twelve hours.”
- <sup>50</sup> 電報（國立公文書館藏，JACAR Ref. A03030011900）“Please telegraph me fresh instructions Takasago Maru Sailed a few hours before my arrival is it not possible for me to reach Taiwan before General Saigo leaves.”
- <sup>51</sup> 見「カッセル帰着届書」，國立公文書館藏，JACAR Ref. A03030035300。

克沙勒在橫濱至少停留到 1875 年 4 月上旬被解僱時，當時他住在 Occidental Hotel，於 8 日下午兩點與華生共同覲見日本天皇，<sup>52</sup>或許在此時，克沙勒與李仙得、華生等人獲日本天皇授予日出勳章。克沙勒患病遲遲未能完全康復，難免有就醫需求，他又一直住在橫濱，很可能克沙勒曾向當時在橫濱行醫的 Stuart Eldridge 求診，二人又有費城同鄉之誼。或許在他離開日本之前，將這四顆牡丹社人頭骨託給 Stuart Eldridge。克沙勒回到美國賓州費城不久，即於 1875 年 6 月病逝。

### 三、華生（瓦生、活生、華遜、ワワソニー）(James Robert Wasson, 1847.01-1923.02.17)

華生<sup>53</sup>生於美國俄亥俄（Ohio）州，1867 年入西點軍校（圖 7），1871 年以全班（41 人）第一名成績畢業，並因協助當時美國總統 Ulysses S. Grant 的兒子 Frederick D. Grant 學習，而與 Grant 家族熟稔。透過 Grant 總統的推薦、協助，當時的慣例、官員的暗助以及華生自己的意願，得以數度延遲履行自軍校畢業後須另服役 4 年的規定。1871 年，經由 Grant 總統核准，Horace Capron 組織外籍顧問特使團訪問日本，在寄給 Horace Capron 的相關信件，Grant 鄭重推薦華生擔任特使團助理。<sup>54</sup>雖然 Capron 並未接納華生作為團員，但華生仍然與其他四位西點軍校同學伴隨 Horace Capron 初次至日本，旋返美國。再至日本後，1872 年 3 月在北海道開拓使 Hokkaido Colonization Office（Kaitakushi）建立的學校教授數學、測量與英文，並協助進行工程建設。1874 年 4 月，李仙得認為華生可「經常穿梭敵人槍林彈雨之中建築堡壘」，且必須承擔其與北海道開拓使合約所無的危險工作，建議日本政府聘其為陸軍工兵之長，可授予陸軍中校榮銜並給予相當於其等級之權力及尊敬。<sup>55</sup>



圖 7：就讀西點軍校時期的華生  
（引自：Cunningham 2004: 4）

<sup>52</sup> 見「カッセル、ワソソン謁見ノ儀ニ付平井外務少丞ヨリ電信達書」，國立公文書館藏，JACAR Ref. A03030041500。

<sup>53</sup> 此節除註明引用文獻外，主要參考 Cunningham（2004）所述。

<sup>54</sup> “He suggested to Capron that if he had not yet selected all of the assistants who would accompany him to Japan, he should consider Wasson”（Cunningham 2004: 7）。

<sup>55</sup> 見李仙得於東京在 1874 年 3 月 13 日呈大隈重信參議第 22 號備忘錄〈論採用外國人之方法及賦予克沙勒少校等級與訂定薪俸事宜〉（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106）。另根據 Cunningham（2004），華生對於李仙得的召募，提出了當以 colonel 銜受聘，薪水不得少於現職的要求（年薪 6,000 美金）。另美國國務卿 Hamilton

與克沙勒同樣，華生不顧 J. A. Bingham 的警告與禁令，與克沙勒毅然與日軍先頭部隊至臺。5 月 6 日抵達琅琦灣後，克沙勒即與華生登岸，共同選擇適合三千人的營址，隔日由華生劃定營帳與防禦線位置。但在社寮聚落北側選擇的野營地點顯然不佳，17 日夜，豪雨突至，野營地旁溪水暴漲漫出，帳篷內床為水浸溼（田中菊次郎 1991: 172）。

1874 年 7 月 1 日，一艘中國砲艇到達南臺，帶來新任美國駐廈門領事 J. J. Henderson 給克沙勒與華生的警告信，建議他們不要參與對中國的惡意行動（Cunningham 2004: 10）。在 1874 年 7 月中旬後，日軍營爆發疫情，華生染疫，於 8 月中旬離臺返日治病，<sup>56</sup> 很快痊癒之後，仍受美國駐日公使所阻，未能再度來臺（豪士 2015: 40）。

1875 年 2 月 19 日華生寫信給李仙得，詢問其今後在日本的職務，主張日本應該在他的主持下建立兵工廠，以避免向外國購買軍火的需要，<sup>57</sup> 華生努力自薦似乎並未獲得回應。該年 3 月 4 日，華生寫信給 Hirai，請求支付其二月份薪資以及 1 至 3 月的額外薪資與津貼，<sup>58</sup> 而日本政府因為並無合適職務，有意解僱克沙勒與華生，正式通知信與日本提供退休津貼與交通補助承諾於 4 月 7 日由李仙得轉致，<sup>59</sup> 4 月 8 日，華生與克沙勒共同覲見日本天皇。

1875 年 10 月，華生在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土木工程，顯然華生居住於東京。1876 年 7 月，華生與 John Bingham 女兒 Mary 完婚。1876 年 9 月，Grant 總統晉升華生為陸軍少校，又於 11 月徇私任命華生出任部隊主計軍銜，華生遂於 1877 年離開日本。但美國主計年薪僅 2,500 美金，遠少於其受聘於日本政府的收入，其後來又有撲克賭博的負債；1882 年 12 月，華生希望請假二年以便短期應聘日本政府測量單位助理一職，但未獲同意。華生於 1883 年 4 月底自導自演公款失竊，並因事蹟敗露認罪，1883 年 7 月，華生被判入獄 18 個月。重獲自由後，華生幾度申請想重返軍旅，終於在 1899 年，華生入伍第 46 步兵團（46<sup>th</sup> Infantry），該兵團隨即被派往亞洲控制菲律賓，但不久，華生即因酗酒及缺席晨起召集被判有罪沒收薪水。

華生在人生許多階段得到不少貴人相助，與當時美國第一家庭的深厚友誼、資深外交官岳父等等人脈，前半生事業可謂順風順水。他顯然是追求自我成就的性格，對

Fish 於 1874 年 7 月 29 日給駐北京代辦衛三畏信函，提及國務院收到戰爭部長正式通知，華生從 1872 年 7 月 1 日起，便已沒有在美國服務。見 House and Senate Documents, 1634 H. exdoc: Foreign Relations, 1874, pp. 300-301。

<sup>56</sup> 根據落合泰藏《明治七年牡丹社事件醫誌》，8 月 12 日有高砂丸載 24 名病患回長崎，有 5 名在航行中死亡；8 月 14 日，明光丸載 24 名病患回長崎（賴麟徵中譯 1995a），都沒有說明華生是否在船上。

<sup>57</sup> 「ワスソンヨリ李仙得工将来職事云々来東」，國立公文書館藏，JACAR Ref. A03031022900。

<sup>58</sup> 「ウッソンヨリ平井外務少丞宛二月分俸金并御手当金請求」，國立公文書館藏，JACAR Ref. A03030039700。

<sup>59</sup> “A letter from Charles Williams Le Gendre to Mr. Okuma attaching a separate reply of Wasson”，國立公文書館藏，JACAR Ref. A03030042000。

金錢甚為看重，在日本國家文書檔案中留下討要薪資書信紀錄；他對金錢需求無度，受僱北海道開拓使期間，似乎留下負債紀錄，並在回國供職數年後，監守自盜。目前並未見到華生對於日軍馘首敵人行為留下如克沙勒譴責的意見，他反而對於日軍有類似豪士般的讚揚言論，是以難以相信華生會清理牡丹社人頭骨並收藏 1~2 年之久。即便華生與 Stuart Eldridge 曾經同在北海道開拓使任職，二人當有接觸，雖不能完全排除華生可能是這四顆頭骨的原始收藏者，但筆者認為可能性甚低。

## 陸、現存四顆頭骨的流傳再議

石門戰役被馘首的排灣先民首級，被帶到日軍大營時，必然在日軍奏凱場合下多人共見。大倉喜八郎回憶即言，當時親見「頭顱已乾」。這些首級甚至可能被公開展示。戰役後第二天，西鄉從道接見琅璫十八社中的六社頭目，這群頭目一定看到了被割取的首級，並指認其中有牡丹社頭目或其子。相關報告指出，「當地人甚至前來加以鞭笞」。<sup>60</sup> 這些被馘的首級若非處於公開展示的狀況，當地人如何前來加以鞭笞？從這些資料，可以推測，當時日軍並未收貯或在意這批頭骨，施行馘首行動並將首級攜回大營的日軍，可能也沒有收藏之意。這批可能被公開展示的頭骨，為何沒有被埋葬或丟棄？是何時被收貯？落入何人之手？而有四顆流落國外。

目前所知，僅有 Eldridge (1877) 與 Turner (1907) 兩篇報導並測量分析牡丹社人頭骨體質特徵的論文，這兩篇論文以及些許零星資訊，提供了關於這批頭骨來源與收藏的訊息。

Stuart Eldridge 於 1877 年 3 月 14 日在日本亞洲學會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晚會上宣讀其對所藏四顆牡丹社人 (Botans, Motans) 頭骨的體質測量報告<sup>61</sup> (Eldridge 1877)。該報告雖然明確指出這四顆頭骨屬於被日本譴責殺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人，但並沒有交待這四顆頭骨從何而來。而在此之前，Stuart Eldridge 已經於 1876 年 11 月將牡丹社人頭骨照片寄給美國 Army Medical Museum<sup>62</sup> (Ganderup 2013)。因此，可以肯定 Eldridge 至少是在 1876 年 11 月以前獲得這批骨頭，在此之後直到其於 1901 年去世，Eldridge 相關資料尚未能查得這批頭骨的收藏或流向。

1907 年，英國愛丁堡大學的解剖學教授兼校長 William Turner (1832-1916) 發表一篇有關亞洲人種的頭骨測量報告，臺灣原住民人骨材料即是 Eldridge 1877 年所研究

<sup>60</sup> 西鄉從道於 5 月 26 日致蕃地事務局長官大隈重信的報告 (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209)。

<sup>61</sup> Stuart Eldridge 亦將該報告寄給 *The American Naturalist*，並於 1878 年 6 月該刊登載報告概要 (Mason 1878)。

<sup>62</sup> Army Medical Museum 所藏的人骨照片後轉給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的 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s (Photo lot 6B) (Ganderup 2013)。

報導的頭骨。根據該文所言，這批頭骨是 Stuart Eldridge 連同其報告交給 William Turner 的好友 John Anderson，而由 Anderson 於 Turner 該文出版約 20 年前（約 1887）交給 Turner。該文並提出了 Eldridge 報告所沒有的頭骨來源資訊，指稱這批頭骨是由征臺日軍砍下，為參與日軍征臺的美國軍官所準備，<sup>63</sup> 該服役於 1874-1875 的美國軍官交給 Stuart Eldridge，中間並未轉手。

Turner 此文提供的出處訊息，無疑是 Eldridge 所掌握原先隨頭骨記載的資訊。1874-1875 年參與日本征臺的美國軍官有初期規劃用力甚深但在此期間始終未能來臺的李仙得，隨先頭部隊來臺的陸軍工兵華生以及海軍軍官克沙勒。克沙勒在征臺軍負責規劃進剿牡丹社戰略，在征臺軍有其一定地位，但在美國干預，李仙得不得來臺，西鄉從道又曾受命，至臺即解除克沙勒與華生的聘用，上無李仙得奧援，又與福島九成不和，其地位景況大不如預期。但克沙勒曾明確表達日軍馘首敵人是與原住民敵人相同的野蠻行徑的意見，是否可能出於表現該有的文明作為，將當時不被人道對待的部份頭骨「搶救」<sup>64</sup> 下來？而克沙勒於 9 月間染患疾疫病重，並於 1874 年 10 月 8 日離臺赴日，最終仍於 1875 年 6 月病逝美國費城。顯然克沙勒雖然在回到日本後，仍然執行被交付的任務，但顯然患病不輕，一直未能完全康復，由於他一直長住橫濱，請當時在橫濱行醫出身費城的 Stuart Eldridge 看診，並託付其保管年餘返日行囊中所攜帶的四顆頭骨，可能性甚高。

沈葆楨農曆五月二十五日（陽曆 7 月 8 日）奏稿，其抵達臺灣府後，「接見鎮、道，據稱四月二十日，倭船一隻，裝生番首級及傷亡倭兵回國。」<sup>65</sup> 農曆該年四月二十日為西曆 6 月 4 日，此日並無日船從臺出航紀錄，最早的一次護送傷兵回長崎醫院為 6 月 7 日晚間 7 點，由落合泰藏護送 26 名傷病患搭乘明光丸輪船出發送回長崎醫院，其中槍傷者 14 名（賴麟徵中譯 1995a），也並無船載有原住民首級的紀錄。此一記載十分即時，為清方調查偵知石門戰役後日軍的動向，時間或有所差池，但是否確有攜帶「生番首級」？若確有此事，且時間在石門戰後數日內，則這些「生番首級」是否只是部份首級？這些被運載的首級流落何處，被如何處置？即以此事發生於沈葆楨奏稿日不久，時間也在克沙勒甚至是華生離臺返日治病前。

Stuart Eldridge (1843.01.02-1901.11.16) 長於美國賓州費城成功商人家庭，<sup>66</sup> 年輕時曾參與南北戰爭，指揮能力突出；1865 年之後，Eldridge 一度在 General Ulysses Grant 主導的 Freedman Bureau 工作，於華盛頓特區任職期間，公餘入喬治城大學醫學院就讀，於 1868 年獲得醫學士學位，成為解剖學助理兼講師；1869 年成為農業部

<sup>63</sup> “The heads had been decapitated by the Japanese soldiers, and prepared for the American officer, in whose custody they remained until he presented them to Dr. Stuart Eldridge, by whom they were given to Dr. Anderson.”

<sup>64</sup> 被割取的頭骨仍須作去肉去脂處理，才能成為較無異味，較易收貯的「標本」。

<sup>65</sup> 見《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頁 26；《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12 記同。

<sup>66</sup> 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s 對於 Eldridge 生平說明指稱其生於紐約（Ganderup 2013）應屬錯誤。

第一任圖書管理員 (Martin-Plugh 2011; タイナー 2001)。1871 年 8 月，美國農業部首長 Horace Capron 准將在北海道開拓使次官黑田清隆 (Kiyotaka Kuroda) 邀請下，組織一個科學顧問團出訪日本，Eldridge 也以顧問團秘書和醫學專家身分赴日，並自 1872 年 2 月起正式被聘為北海道開拓使政府函館病院的外科醫長 (Surgeon-General) (Ganderup 2013)。在此年 5 月末至 6 月初，布朗作為 *Thabor* 號船長，至北海道調查可作為燈塔的地點並接運橡木材。該船的第二乘務員 (2<sup>nd</sup> steward) George Mackinnon 因妄想症，Eldridge 醫師於 6 月 6 日該船抵達函館<sup>67</sup> 當日即來鑑診 (Bush 1969: 42)，布朗船長可能在此時，與 Eldridge 有所接觸。(圖 8)



圖 8 : Stuart Eldridge

(引自：<http://www.henrytegnor.com/stu-eld.htm>, Last updated June 2011, 2020.08.28 搜尋)

1872 年 8 月，Eldridge 在函館病院建立了北海道第一所醫學院「函館醫學校」，親自教授、培訓日本政府公費資助或私人付費的學生。同時創辦了據信為日本第一份日文醫學期刊《近世醫說》*Kinsei-I-Setsu* (姜可祐、涂豐恩 2020)。與日本政府簽訂的合同於 1875 年到期後，Eldridge 轉至橫濱定居行醫，直到 1901 年去世。<sup>68</sup> 在橫濱期間，Eldridge 曾擔任十全病院、<sup>69</sup> 山手一般病院 (Bluff Hospital) 院長、神奈川縣衛生廳顧問，以及日本政府內務省衛生局委員 (1883)。1897 年獲頒瑞寶勳章。1901 年，Eldridge 過世，安葬於橫濱外國人公墓。<sup>70</sup>

William Turner (1832.01.07-1916.02.15)，英國 Lancaster 人，自小便在家鄉隨在地醫生習醫，1850 年在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從師 James Paget，1854 年 Paget 將他推薦給愛丁堡大學解剖學教授 John Goodsir 擔任助理，為 senior demonstrator in anatomy，並同時就讀於倫敦大學，1857 年獲醫學學位，同年以 25 歲著書 *Atlas of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出版，因此聲名鵲起。1865 年，Turner 由 John Goodsir 推薦並當選為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並於該年創辦 *Journal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Goodsir 於 1867 年去世後，Turner 繼任成為愛丁堡大學的解剖學教授。之後，陸續擔任過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解剖學會、英國醫學總會主席，愛丁堡大學校

<sup>67</sup> *Thabor* 號於 6 月 11 日駛離函館，並於 6 月 18 日回到橫濱。

<sup>68</sup> 《北海道志》卷一五〈人物・職官三 (外客)〉作「須知愈和留度、阿瑠度律智」，並載其於明治 4 年 9 月受聘，7 年 10 月 31 日約滿解職 (開拓使編 1884: 475)。

<sup>69</sup> 為橫濱市立大學病院前身。

<sup>70</sup> 參據 *Kinsei-I-Setsu* 所發訃文、姜可祐與涂豐恩 (2020)、タイナー (2001)。

長，是世界極富盛名的比較解剖學權威。<sup>①</sup>因此，很可能 Stuart Eldridge 認知，Turner 是當時世上最適合給予這批頭骨分析研究且歸類定位的研究者。

Turner (1907) 自言此四顆頭骨是其好友 John Anderson (1833-1900) 轉交。Anderson 生於英國愛丁堡，於愛丁堡大學醫學系就讀期間，師從 John Goodsir，主要專攻解剖學及動物學，並於 1862 年獲得醫學學位，與 Turner 有師友之誼。畢業後，曾短暫於自由教會學院 (Free Church College，今愛丁堡大學新學院) 擔任自然史教授，旋即於 1864 年起遠赴英屬印度加爾各答，負責籌設印度博物館 (Indian Museum)，並成為首任館長，此後長期擔任該職位，直到 1887 年卸任退休。1884 年，Anderson 前往日本，蒐集了大量北海道愛奴人的手工藝品，可能在此時，Anderson 與 Eldridge 有交流互動機會 (姜可祐、涂豐恩 2020)。

Stuart Eldridge 曾在北海道停留數年之久，對於愛奴人的文化應有所接觸，曾撰寫愛奴人所用箭毒的活體 (狗) 實驗分析 (Eldridge 1876)。Anderson 或許因此在日本時曾與 Eldridge 聯繫，<sup>②</sup>並因其具解剖醫學背景，Eldridge 因此邀請 Anderson 觀察牡丹社人四顆頭骨，進而託付其進行研究或轉交給其他合適者 (如 Turner) 研究。或許 Eldridge 認為，博物館是這批頭骨較好的典藏環境，也更容易讓更多有興趣的學者研究。<sup>③</sup>三年後，1887 年 Anderson 卸任印度博物館館長職，返回英國之後，將這四顆頭骨轉給 Turner。

## 柒、結論

牡丹社事件當年震動東亞，不僅日本、清廷、臺灣涉入，在東亞有貿易利益的英、美、俄等國，亦都或淺或深地插足其間。本文從目前流外的 4 具牡丹社人頭骨為起點，探究 1874 年石門戰役中排灣先民死難與被馘首的相關問題，期望能增添這 4 具頭骨乃至其餘去向不明頭骨的相關資訊。

牡丹社事件規模最大的石門戰役，牡丹社人及其聯盟諸社死亡約 30 人，被馘首數量有 12、16、18，甚至 15、17 之說，但以目前所見資料，似乎當以 16 具為是，但也無法完全排除 12 具的可能。日軍既然戰勝，卻與未開化人群一般，割取戰敗者首級，其目的除讓西鄉都督親驗邀賞之外，也有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的目的，

① 參據網路資料、姜可祐與涂豐恩 (2020)。

② 未詳 Anderson 與 Eldridge 是在何地何種場合下見面，又是在何種情況下交付這四具頭骨。

③ 根據 Stuart Eldridge (1877) 所言以及其撰寫測量報告後將相關資料寄交一些出版、典藏單位，是有意廣泛地引起國際頭骨學專家注意的意圖。

並間接促使週邊漢庄、平埔族聚落與排灣諸社人畏服投誠，牡丹社及其聯盟高士、爾乃諸社被孤立，日方三路大軍挺進，未遇具規模的抵抗，迅速結束戰爭。而透過前人對四顆頭骨的體質研究，顯示都為具親族關係的壯年男性，生前大都受有重創與可能是死後被馘首之外的劍創。這批頭骨最可能是美籍海軍軍官克沙勒保存，並於 1874 年 10 月從琅瑤帶到日本，交給在橫濱執業、教學的 Stuart Eldridge。在經過初步測量分析之後，Eldridge 自覺經驗與訓練不足，沒有足夠的比對材料，難以對牡丹社人進行合適的人種歸類，於 1884 年，透過到訪的 John Anderson 將之轉交給當時世界醫學界知名的愛丁堡大學比較解剖學教授 Willian Turner 研究，最終進入該校博物館典藏。

西鄉從道於石門戰役後幾日內呈送給蕃地事務局報告，言之鑿鑿提及，經十八蕃社部份頭目指認與所擄獲武器判斷，割取的頭骨中，包括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頭骨。然而根據從軍的美籍顧問華生報告及隨軍記者豪士所記，經過指認確定有阿祿古兒子的首級，並因擄獲阿祿古所用的火槍，判斷阿祿古身受重傷，阿祿古隔日死亡，暗指阿祿古並未被馘首。<sup>74</sup> 隨隊軍醫落合泰藏在其回憶錄更明言，某些書鉅細靡遺地描述阿祿古父子被日軍斬首並非實情，而是與其他戰死者一起被日軍葬在蚊阿社，日軍從琅瑤退兵之際，將之改葬至石門並立碑，至其撰回憶錄時猶存，日本領臺後，為彰顯其頑強抵抗之志氣，日本天皇賜予經費，命人在其碑前進行追弔祭（落合泰藏 1920: 78）。是耶？非耶？難道是因為阿祿古被馘首已由西鄉從道定調，心有不然者或隱忍不言、或含糊其詞？

以目前掌握的資料可以判定，阿祿古之子在 5 月 22 日石門戰役當天戰死，並被日軍割取首級；阿祿古本人則在當天受到重創，於隔日死亡，並未被日軍馘首。包括阿祿古在內的眾多石門戰役死亡的原住民屍體，可能被二次移葬於石門附近，確實位置何在，有待各界關注繼續深入研究。現存的四顆牡丹社人頭骨不存在阿祿古頭骨，但是否包括其子的頭骨則無法確定。此外，石門戰役當時日軍帶回營區的原住民頭骨有十餘顆之多，但目前所知下落的僅有四顆頭骨，其餘的頭骨安在？為何當時美國軍官僅提供 Eldridge 四顆，是其收貯保存的頭骨僅此四顆，其餘的為他人收走？還是美國軍官並未完全交出他所收藏的人骨？

19 世紀時期，外人收存原住民頭骨其實不僅此四顆。Swinhoe 於 1856 年 3 月前往新竹香山，在海邊發現一些漢人與原住民衝突中被殺而遺留於海邊的原住民人骨，Swinhoe 採集一顆已被海水漂白的原住民頭顱，提供了對此年輕頭骨的觀察，並且

<sup>74</sup> 豪士該書中描述石門之戰，第 16 章有如下的描述：「日軍從石門戰場帶回牡丹社人遺留的武器，其中有一支火槍被指認出是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的武器，顯示阿祿古已受到致命重傷。而且他兒子的頭顱也夾雜在幾顆被割下的人頭中，被指認出來。阿祿古的兒子是年輕輩的領袖，他已死的消息傳開後，帶給所有的部落，尤其敵對者沈重的衝擊。」（豪士 2015: 120）

說明若非偷渡其上船有所困難，他將帶走更多的人骨（Swinhoe 1856）。德籍醫生與人種學家 Arnold Schetelig 描述其研究臺灣原住民體質，提及曾委託其在臺灣的友人代為收集頭骨，但是極不容易，獲得兩顆從山上帶下來顯然是被砍下的頭骨（Schetelig 1869）。而烏居龍藏在進行臺灣南部排灣族調查時，曾在力里社盜竊頭骨架內屬於下白露社人頭骨，並在望嘉社偷換該社新獵力里大社人頭，「帶回東京帝大當標本研究」，美其名曰學術探險（烏居龍藏 2016: 24）。無論收集收藏的目的如何學術、高尚，但以現代原住民族相關遺留宜返還當地的進步觀念，以及對於人類體質遺留應慎重對待的倫理要求，如許多流傳國外的原住民骨骼，都應該是國內各界關心者以及政府相關單位宜注意其所在並戮力訪回的使命。

## 引用書目

### 一、歷史文獻

- 平良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平良市史》第三卷《資料篇・前近代》，平良：平良市役所，1981。
- 田代幹夫編，《臺灣軍記》，河內屋文助，1874。
- 伊藤久昭編，《臺灣戦争記》，東京：吉田屋文三郎，1874。
- 東條保，《臺灣事略》，東京：小倉万次郎，1875。
- 津江左太郎，《臺清紀事》，協力社藏版，東京：長野亀七，1875。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0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 二、近代文獻

又吉盛清編

- 1985 《台灣事件關係資料論文集》，出版地不詳。

不著撰者

- 1906a 〈佐久間總督談（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No. 2439（1906.06.19），第2版。
- 1906b 〈總督臨恒〉，《漢文臺灣日日新報》No. 2456（1906.07.08），第3版。

王學新中譯

- 2003 《風港營所雜記》，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 No. 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白尙德

- 2006 〈十九世紀法國旅行家和台灣原住民的接觸〉，收入葉春榮主編，《歷史、文化與族群：台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頁127-141。

田中菊次郎

- 1991 《台湾出兵》，出版地、出版者不詳。

西里喜行

- 1988 〈台湾事件（1871-1874）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篇I）〉，《琉球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一部・第二部33：233-303。

- 1989 〈台灣事件（1871-1874）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篇Ⅱ）〉；《琉球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一部・第二部 34：145-180。
- 西鄉從道
- 1877 〈琉球藩民枉死之碑〉，收入西田森三編輯，《明治大家詩文》，東京：山中孝之助，卷上，頁 26a-27a。
- 周婉窈
- 2015 〈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臺灣風物》65.2：23-89。
- 林呈蓉
- 2006 《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2011 《水野遵——一個台灣未來的擘畫者》，臺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 林呈蓉譯註，水野遵原著
- 2011 《臺灣征蕃記》，收入林呈蓉，《水野遵——一個台灣未來的擘畫者》，附錄三，頁 164-277。
- 林修澈
- 2017 《牡丹社事件》，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 邱上嘉、黃妙婉
- 2018 《「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理念與執行參考手冊》，新北：文化部。
- 青鳥文化制作、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
- 2020 《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計畫學術調查研究暨研討會期末報告（修正三版）》，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委託計畫，青鳥文化制作、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 姜可祐、涂豐恩
- 2020 〈從南國到萬國——牡丹社事件與十九世紀人類學知識的全球交流〉，收入蔡瑞珊、涂豐恩主編，《『南國與萬國的交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屏東縣政府，頁 241-302。
- 梅陰生
- 1906 〈石門進擊の驍將としての新總督〉，《臺灣日日新報》No. 2416（1906.05.23）。
- 郭伯佾
- 2015 〈從琉球藩民墓碑文探索牡丹社事件〉，《實踐博雅學報》22：81-99。

- 鳥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註  
2016 《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版。
- 黃得峰、王學新中譯  
2005 《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 No. 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開拓使編  
1884 《北海道志》，札幌：北海道同盟著譯館。
- 落合泰藏  
1920 《明治七年生蕃討伐回顧錄》，東京：落合泰藏。
- 慶留間知德編  
1929 《那霸古實集》，那霸：慶留間知德。
- 福田滋次郎  
1910 《今上詔勅集》，東京：晴光館書店。
- 豪士（House, Edward H.）原著，陳政三譯註  
2015 《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藤崎濟之助  
1931 《臺灣全誌》，東京：中文館書店。
- 賴麟徵中譯，落合泰藏原著，下條久馬一註  
1995a 〈明治七年牡丹社事件醫誌（上）〉，《台灣史料研究》5：85-110。  
1995b 〈明治七年牡丹社事件醫誌（下）〉，《台灣史料研究》6：107-127。
- タイナー，ヘンリー（Tegner, Henry）  
2001 〈お雇い外国人医師 J・S・エルドリッジ〉，《有鄰》408：4。  
[https://www.yurindo.co.jp/read/yurin/back/408\\_4.html](https://www.yurindo.co.jp/read/yurin/back/408_4.html)，2020.10.20 搜尋。
- Anonymous  
nda *House and Senate Documents, 1634 H. exdoc: Foreign Relations, 1874;*  
From: ProQuest U.S. Serial Set Digital Collection.  
ndb *House and Senate Documents, 1672 H. exdoc: Foreign Relations, 1875,*  
*pt. 1;* From: ProQuest U.S. Serial Set Digital Collection.
- Anonymous  
1875 “Formosa and the Japanese.” *All the Year Round* 13.326: 463-468.

- Barclay, Paul D  
2018 *Outcasts of Empire: Japan's Rule on Taiwan's "Savage Border," 1874-1945.*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sh, Lewis  
1969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Illustrious Captain Brown: A Chronicle of the Sea and of Japan's Emergence as a World Power.* Tokyo: Voyager's Press Ltd.; Rutland, Vermont: Charles E. Tuttle.
- Cunningham, Roger D.  
2004 "‘Recreant to His Trust’: The disappointing career of Major James R. Wasson." *Army History* Winter-Spring 2004: 4-18.
- Edgar, Henry  
1875 "Tak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74." 收入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台灣海關歷年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139-148。
- Eldridge, Stuart  
1876 "On the arrow poison in use among the Ainos of Yezo."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4: 78-88.  
1877 "Notes on the crania of the Botans of Formosa."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5.1: 158-169.
- Eskildsen, Robert  
2019 *Transforming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The Taiwan Expedition and the Birth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 Eskildsen, Robert, ed.  
2005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Western Sources Related to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Ganderup, Sarah  
2013 *Stuart Eldridge Photograph Collection of Skulls from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circa 1877-1881.* Suitland, Maryland: 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s, Museum Support Center.
- Gordon, Leonard H.  
2007 *Confrontation over Taiwa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the Power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Martin-Plugh, Debroah  
2011 *Notable Character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That My Mother Would Love.*  
<https://notablecharacters.wordpress.com/2011/02/12/making-history/> ,  
2024.06.24 搜尋。
- Mason, Otis T., ed.  
1878 “Anthropology.”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2.6: 400-405.
- Schetelig, Arnold  
1869 “On the natives of Formosa.” *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7: 215-229.
- Swinhoe, Robert  
1856 “A trip to Hongsan, on the Formosan coast.” *Supplement to the Overland China Mail (Hong Kong)*, No. 130, 13 September 1856.
- Turner, William  
1907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aniology of the natives of Borneo, the Malays, the natives of Formosa, and the Tibetan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45.3: 781-818.

### 三、網路資訊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s://www.jacar.go.jp/>